

中国代表团为何不再只盯着金牌？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9月19日,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拉开帷幕。本届赛事是国家体育总局提出“633”竞技体育战略后,中国代表团首次在夏季综合性国际大赛中完成全阵容亮相。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中国代表团从项目取舍、人员配置到参赛目标均有所不同——本届亚运会将紧扣“十五五”时期“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核心发展方向,把亚运会直接转化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中期练兵场。简单来说就是:巩固优势项目的领先地位,提升基础大项的竞技实力,同时全力推动“三大球”振兴,最终带动其他项目均衡发展。



9月16日,体操运动员孙炜(右二)、兰星宇(左二)和邹敬园(左一)在抵达名古屋后集合 新华社发

资源转向“633战略”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竞技体育转型的关键五年。这一周期的核心任务不再是单纯追求奥运金牌榜的座次,而是要搭建更健康、更可持续的项目发展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633”竞技体育战略正式出台——将全国竞技体育核心资源划分为三大板块:“6”是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六大传统优势项目,第一个“3”是田径、游泳、水上运动三大基础大项,第二个“3”是篮球、排球、足球三大集体球类项目。实施跳水、举重、体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优势项目荣耀工程”,田径、游泳、水上等项目的“基础大项强基工程”,稳步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这套划分打破了过去“平均分

配备战资源、所有项目都要冲金”的旧思路,把有限的备战资金、教练资源和国际赛事名额进一步集中投向12个核心项目。

从本届名古屋亚运会的代表团数据来看,“633”战略的味道已经清晰显现。本届中国代表团运动员815人,对比杭州亚运会的886名运动员阵容,参赛布局进一步向核心板块收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选手占比达到27%,超三分之二的选手首次登上亚运会赛场,练兵意味极浓,相比于杭州亚运会夺得201枚金牌,本届亚运会客场作战金牌数可能会回落,但本届亚运会将大规模锻炼年轻梯队,为下一个奥运周期摸底,并非一味追求金牌数量最大化。

六大传统优势项目作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基本盘”,在过往几届奥运会,贡献的金牌数,始终占据中国队金牌总数的六成以上。往届亚运会的参赛逻辑也十分明确:派出全主力阵容,尽可能包揽所有金牌,巩固领先优势。但到了本届亚运会,这套思路已经发生了明显调整。

举重项目的变化具有代表性,完成大规模新老交替的中国队仅有李雯雯、刘焕华两名奥运冠军坐镇,其余8人均是首次参加大型综合性国际赛事。两名奥运冠军仍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何岳基与杨柳月等新人也实力强劲,但缺乏国际顶级大赛的经验。中国队这次参赛的目标不单是要拿多少金牌,更是要让年轻选手提前适应新级别下的对抗节奏,在大赛中检验试举稳定性和临场心态。

乒乓球项目同样体现出鲜明的“以练为主”导向。此前WTT瑞典大满贯赛事

上国乒男单6人全部止步16强,世界排名前十里仅剩2位中国选手,男队稳定性不足的隐患充分暴露。本届亚运会国乒“00后”年轻选手占比达到70%,呈现“核心压阵+新人试练”双轨思路。梁靖崑、陈幸同、王艺迪等大赛经验丰富的名将没有出现在名单里,替代他们的是温瑞博、向鹏、陈熠、蒯曼、范姝涵等新人,年仅21岁的林诗栋身兼四项出战,能够让他在高密度的多线作战中锻炼体能分配和关键分处理能力。

跳水、体操、射击、羽毛球四个项目也全部采用“奥运冠军带新人”的阵容结构,既保留陈芋汐、王宗源等核心主力守住基本盘,也给何沁沁等“05后”小将提供顶级大赛出场机会,不再把“100%包揽金牌”当作硬性要求,在保证整体领先优势的前提下,完成新老阵容的平滑交接,让优势项目的人才厚度在整个“十五五”周期始终保持世界顶尖水平。

三大基础大项转向“全面抗衡”

三大基础大项在“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方向,是从过去的“局部突破”转向“全面抗衡”。田径、游泳、水上运动一直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短板,巴黎奥运会上这三个项目中国队拿到的金牌数占比不到15%,和美国、澳大利亚等体育强国差距明显。“十五五”规划将这三个项目列为重点补强板块,目标就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金牌数量和奖牌数量的双重突破,名古屋亚运会正是检验这一阶段备战成果的最佳试金石。

在本届亚运会,中日游泳的亚洲霸主之争是赛事最大看点,杭州亚运会上中国队拿到28金力压日本队登顶,但巴黎奥运会上日本游泳队拿到3金,整体上升势头迅猛。中国队此次派出张雨霏、覃海洋领衔的40人全主力阵容,目标早已不止保住金牌数第一,更要在男子中长距离、女子仰泳等过去长期落后的短板小项

上和日本选手正面较量,搭建起覆盖更多小项的完整人才梯队。

田径赛场中国队由谢震业带领年轻选手出战,重点锻炼男子4×100米接力、女子投掷等传统优势项目的大赛稳定性,同时在竞走、中长跑赛道挖掘新人,17岁短跑新星陈好颜凭借全国锦标赛11秒08的亚洲青年纪录入选阵容,成为新生代田径选手的代表性面孔。

水上运动的皮划艇、赛艇、帆船等项目派出年轻阵容,核心目标就是在亚洲赛场拿到更多奥运参赛席位,为洛杉矶奥运会实现满额参赛铺路。

三大基础大项的亚运对抗,本质上是两年后洛杉矶奥运会的提前预演,中国队要通过这次赛事彻底摆脱“个别尖子选手单点突破”的旧模式,形成整体阵容和世界强队全面抗衡的能力。

“三大球”需长期振兴

三大球项目在“十五五”周期的核心目标,是从“短期冲金”转向“长期振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篮排足三大集体球类项目都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痛点,“十五五”规划专门把三大球振兴列为重点任务,不再追求短期的亚运会、奥运会成绩,而是从梯队建设、青训体系、联赛改革等底层逻辑入手,用五年时间夯实基础。

本届名古屋亚运会,“三大球”队伍都以年轻阵容为主,基本不征召已经过了巅峰期的老将“刷成绩”,目的就是让年轻队员在洲际大赛的高强度对抗里打球,打磨团队战术和大赛抗压能力。

男足本次落入阿联酋、伊朗、朝鲜所在的“死亡之组”,外界普遍不看好出线前景,但这支以

2003年年龄段国青主力为班底的队伍,积累的大赛经验对未来冲击奥运预选赛至关重要。男女篮、男女排同样以年轻球员为主,把实战机会留给新阵容,这种主动放弃短期成绩包袱的选择,或许是“三大球”真正走出低谷的开始。

业内人士分析,本届亚运会中国队依然具备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的实力,但撇开“金牌”从另一个角度看,本届亚运会最核心的价值,是中国竞技体育开始告别“为了金牌全线出击”的旧模式,正式进入了“聚焦核心项目、服务长期战略”的新阶段。

站在“十五五”的开局节点,名古屋亚运会更像是中国竞技体育转型的分水岭,它为未来五年体育强国建设打下了最坚实的实践地基。



郭绍纲先生近照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摄

九月开学季,广州美术学院红砖教学楼里,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学生们也许不会想到,70多年前,他们的老母校——位于武汉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教学楼却是用芦苇搭建而成的“席棚”。1953年秋,文化部根据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宏观布局,整合中南文艺学院、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和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的美术系(科),在武汉创立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即广州美术学院的前身。但原校舍在抗战中被大面积炸毁,难敷所用。因此,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南美专任教的郭绍纲,接到校长胡一川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计“临时教室”。

当郭绍纲奉命设计、督造“席棚”时,国内美术界正掀起一阵“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尾声之际,我国大规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年轻的郭绍纲老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苏的留学生。

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实行院系大调整的时代命题,支起了以郭绍纲为代表的公派留苏美术生的人生转折点,也夯实了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建设的路基。

2026年恰逢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登门拜访94岁的郭绍纲先生,听他亲口讲述当年赴苏联留学的往事。回望中俄在美术领域的交流佳话,至今仍在照亮中国美术教育的前行道路。

从涅瓦河到珠江： 郭绍纲的留苏岁月与中国美术教育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涅瓦河畔的求索

向西方学习,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之路的核心叙事之一。20世纪50年代,这一叙事具象为向苏联学习,再具体到美术领域,则体现为大批学子被选派留学苏联,学习科学、文化和美术知识。

作为留苏学生之一,美术史论家晨朋(李玉兰)在《旧迹新痕——中俄美术交流史话》一文中写道:在多达上万户的留学生里,赴苏联学习油画、雕塑、版画、舞台美术及美术史论等专业,为数只有33人。其中31人就读于苏联最高美术学院——位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

列宾美术学院。

郭绍纲早年得天津留儒启蒙绘画,在中央美院受过徐悲鸿、李可染、吴作人、萧淑芳等先生教诲,他对这次留学之旅是期待且深感责任在肩的。1955年8月,经过七八天的舟车劳顿,这个23岁的高大青年来到了涅瓦河畔的列宾美术学院。

时至今日,郭绍纲还能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列宾美院以俄国画家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命名,他是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个画派打破当时只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举办展览的惯例,面向社会大众巡回展览,展出了一批情动于中的画作。是的,情动于中。”

强调“情动于中”,是因为郭绍纲始终忘不了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列宾专门到河畔写生,和纤夫交朋友,进行大量观察和写生,创作出沉闷压抑气氛下奋力拉纤的纤夫群像。“这对中国艺术界的启发很大,画家要表现社会、为群众服务,就必须饱含感情,深入生活。”郭绍纲说。

深入生活,追求朴素

深入生活,追求朴素的审美,是郭绍纲对列宾美术学院学的“初印象”,也是他进入尤·涅普林采夫画室学习后遵循的创作准则。

尤·涅普林采夫是苏联的“人民美术家”,以油画《战罢休息》闻名。该画作描绘了红军战士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对生活、对革命的乐观精神,其复制品曾被苏联政府赠送给中国政府。

“苏联的绘画教学重视素描,有时

候完成长期作业需要70课时,耗时近一个月。”郭绍纲回忆,留学时每天上两节素描课、一节油画课。素描课安排在上午9点到11点,清晨自然光便于分辨色彩细微差异,也能在灯光下精准捕捉物体的光调与质感。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上油画课,此时可借助灯光精准辨别物体色彩。午休后是解剖学、透视学、美术史等理论课。

在随后几年里,郭绍纲潜心于油画学习和创作,画有大量速写、素描、肖像和风景油画。学习之余,他在造船厂、部队等地写生、体验生活,参观博物馆、美术馆,临摹大师名作,举办作品展,度过了充实而紧张的留学时光。

说起留苏期间的代表作,郭绍纲最先想起的便是《戴红帽的女青年像》。画中主角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现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学生薇拉,一身褐色外套,头顶醒目的酒红色绒毛帽,恰好衬出她刚从雪场归来的透红脸颊。米灰色斑驳背景像一层柔化的冬日薄雾,笔触静谧纯净。

今年5月闭幕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郭绍纲作品展”中,这幅作品与其余220余件创作一同展出,其中不少人物肖像、速写与素描,都是他留苏时期的作品。“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品,总有一种自豪感。我们画得应该比外国人强,至少是不差。”郭绍纲说。

苏联美术基因的“中国化生长”

在以郭绍纲为代表的留学生“走出去”的同时,中国美术界也注重“请进来”,邀请苏联艺术家来华授课。科

学严谨的造型方法论、历史题材的史诗性叙事以及艺术家对社会议题的精准描绘,都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美术。

1960年,郭绍纲回国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他观察到当时国内的美院学子整体欠缺素描能力,便开始将列宾美术学院教学体系融入学校原有体系。1962年,广州美术学院开始设置素描、油画、创作三门课程。

“我们不照搬苏联的教学方式,而是思考怎样才适合自己的学生。”在他看来,美术创作需要长期积累,这和老师的指导密不可分,授课教师应具备独到眼力,这也让他想起在苏联学习的小细节:学生除了在自己的素描作业上签名,还要写上指导老师的姓名,意味着老师要为学生的作业负上一定责任。

郭绍纲认为,必须从长期的反复实践中才能获得素描基本功和对素描艺术语言的把握能力。同时,他从形神、气韵、笔法、墨法等传统画论入手,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素描观”,这正是他中西融汇的美术创作思想的写照。

1981年,郭绍纲组建了广州美术学院教育系(今该校美术学院前身)并任首任系主任,在全国首次提出“重视和加强美术教育学科建设的倡议”,培养出了杨尧、吴正斌等一批批优秀的艺术家。1999年,他获得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衔和俄罗斯政府文化部授予的普希金奖章。

作为艺术家,郭绍纲的画朴厚含蓄,一如邵大箴的评价,“不以外形取胜而以内质予人精神与心灵感染的内美”;作为教育家,他的美育思想立足中国传统文化,面向世界,回应时代之需。

艺术人生始终牵系两条河流

如果说在20世纪初留学海外并回国兴办教育的美术教育家们,代表对现代性个性化、多元化探索,那么郭绍纲所代表的一代美术家,则是系统化塑造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一代。

“郭绍纲先生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苏联教学,强调观察生活、夯实造型与色彩基础,为广美油画系后续改革发展奠定扎实基础。”作为郭绍纲的亲授学生,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杨尧认为,老师走出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正道。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首任院长林钰源,至今记得初入广美时,见到郭绍纲留苏作品时的强烈震撼。他认为这些画作给广美学子带来了全新的自然观察视角与艺术思维启发,“这种对外来艺术体系进行学习、消化并形成自身面貌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自20世纪60年代从苏联留学回国后,郭绍纲多次向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等机构无偿捐赠自己的重要作品。毕业于广美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凯熹说,这些老师原作是“最好的教科书”。作品里藏着的严谨功底、鲜活笔触与深沉热爱,为后世同时树立起了艺术创作与为人治学的双重标杆,直到当下,依然在指引着艺术教育的初心方向。

郭绍纲的艺术人生始终牵系着两条河流:一条是他青年时孜孜求学的涅瓦河,一条是他归国后耕耘半生的珠江。“我把留苏作品捐给学校,是希望每一届新生都能亲眼见证这种美术教育的交融,了解这段重要的文化交流史。而且,这种交流应该延续下去。”



郭绍纲《戴红帽的女青年像》布面油画